学术专论

“意大利建国三杰”形象在近代中国的塑造及演变

袁鸿宇　秦　方

[摘要] 19世纪后期，“意大利建国三杰”通过传教士的工作进入中国知识界，中国的各个群体基于各自的立场和目的对“三杰”的形象做出了不同的诠释。20世纪初，梁启超对《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的译著，使“三杰”的形象在晚清中国广泛流传开来，成为传播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救亡图存的议题一直贯穿着整个民国时期，“三杰”的相关事迹也不断得到宣传，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然而，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下，“三杰”的形象不可避免地被工具化，以致三人的形象和他们原来的面貌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

[关键词] 意大利建国“三杰”　梁启超　形象学　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2）－01－0112－013

甲午战争后，救亡图存成为清末最为突出的公共议题。面对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清季士人渐感本土的思想资源难以应对时局，开始从域外寻找知识资源，学习西方国家的强国之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历史人物以各种形式的典范形象进入中国，其中“意大利建国三杰”，即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加富尔（Camillo Benso, Count of Cavour, 1810—1861）和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占有重要的位置。1902年，梁启超

[收稿日期] 2021-06-25

[作者简介] 袁鸿宇（1995—　），男，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89，yuanhy1995@126.com；秦方（1980—　），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9，fqin@cnu.edu.cn

① 学界有关“意大利建国三杰”在近代中国的讨论尚不多见。俞旦初梳理了20世纪初意大利三杰在内的西方爱国人物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论述了这些人物如何被用来激励中国读者的爱国热忱，但其研究范围局限于清末，没有对意大利建国三杰在近代中国的传衍作整体考察，参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外国爱国人物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世界历史》1991年第3期。而对于梁启超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郑宣景考察了朝鲜对《三杰传》的翻译情况，探究了在中朝两国如何通过吸收西方英雄叙事来进行爱国启蒙，但没有对《三杰传》做出较为深入的解读，参见郑宣景：《韩中英雄叙事的译介——以对〈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的接受为中心》，《2015年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暨汉语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摘要集》。相关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来自松尾洋二，后者考察了梁启超创作所依据的史料出处，指出梁氏此传大部分是根据平田久编译的《伊太利建国三杰》以及《近世世界十伟人》中所收松村介石的《嘉米禄·加富尔传》，并参考其他书籍补充而成，参见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了《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希望以此唤起国人的爱国热忱。“三杰”使意大利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壮举，迎合了清末知识分子的强国构想，成为传播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在晚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然而，上述典范形象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三杰”的形象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自 1860 年代以来，意大利建国史的各种相关知识渐次传入中国，在当时特有的历史语境下逐渐为人所熟知。近代中国的各个群体基于不同的立场和目的，对“三杰”的事迹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解读，使其成为一个凝聚了多重意义的政治符号和精神象征，参与并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思想活动。本文试图考察近代中国不同时期意大利建国史书写的基本特征，勾勒出 1860 年代至 1949 年近百年间“三杰”形象塑造的演变历程，以探究各个社会群体对异国知识接受的特点及其中所体现出的政治诉求与社会心态。

一、意大利建国史在晚清的早期传布

1866 年，斌椿使团访问欧洲，在途经意大利城市墨西拿时，所用的参考书是徐继畬的《瀛寰志略》。① 书中对意大利的描述是：“拿破仑败，诸国公使会议于维也纳，分其地为九，大国四曰罗马、曰多斯加纳、曰萨尔的尼亚、曰那不勒斯，小国五曰巴尔马、曰摩德拿、曰卢加、曰摩纳哥、曰胜马里虐，犹总称意大里亚。”②

然而，此时意大利的局势和书中的描写相比已天差地别。早在 1831 年，马志尼即在马赛创立了青年意大利党（La Giovine Italia），希望以发动起义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共和国。尽管起义以失败告终，但马志尼的活动唤起了意大利人的民族意识。1848 年，西西里爆发起义，揭开了意大利 1848 年革命的序幕。在自由主义的呼声下，撒丁王国颁布宪法，并出兵支持北部的独立运动，与奥地利开战。虽然意大利第一次独立的尝试在奥地利的镇压下遭到失败，但撒丁王国已被视为民族统一的希望。

1852 年，加富尔被任命为撒丁王国宰相，在任期间，他依靠灵活的外交手腕，主导了意大利统一的进程。1859 年，撒丁王国依靠法国的帮助战胜奥地利，使后者控制下的伦巴第并入撒丁。1860 年，托斯卡纳、摩德纳、帕尔马等国人民举义，脱离了奥地利的控制，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并入了撒丁王国。同年，西西里再次爆发起义，加里波第率领远征军前往支援，解放了西西里岛和那不勒斯，并为了民族统一的理想将南意大利献与撒丁。次年，撒丁王国改称意大利王国。1866 年，意大利参加普奥战争，从奥地利手中收复了威尼斯等地。至 1870 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意大利攻占受法国保护的罗马，完成了国家的最终统一。

然而，此时处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获取意大利信息的主要渠道仍然是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这两部书对意大利的介绍还停留在 1815 年维也纳和约时的形势。徐、魏之书出版之后，遭到了朝野非议，以致后继者寥寥，之后的几十年间都鲜有相关著作问世。

中国士人最早接触到意大利统一的历史，是通过考察团。1868 年，蒲安臣使团出访欧洲，对意大利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沿革做了考察。接替蒲安臣领导使团的志刚在日记中写道：“意大利，古罗马一统之国，中国称为大秦，为天主教之宗国，挟制欧洲列国以称雄。其后浸衰，分为列邦，四分五裂，不相统属。现君委克都阿第二，原都阑列邦之主，十余年间奋发有为，攻取兼并，遂得意大利全境，俨为大邦。”③

① 斌椿：《乘槎笔记（外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7 页。
② 徐继畬：《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第 182–183 页。
③ 志刚编：《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11 页。

可以看出，这段描述与事实不尽相符，掺入了作者依据中国传统所进行的想象。在志刚笔下，意大利的统一是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 II, 1820—1878）凭借才干，以武力兼并诸国。这种印象一直延续到1870年代末。1878年，《申报》刊登了伊曼纽尔二世病逝的消息，对后者生平的介绍沿袭了上文的说法："意大利国王名非托以满揑因病薨逝，按意大利此王原以雄武才识著名于欧洲各国，生平将意大利各小分国联而为一，遂成大国。"①

到1880年代，通过传教士的工作，中国人终于对意大利统一的历程有了完整的认知。1882年，美国传教士谢卫楼（Devello Z. Sheffield, 1841—1913）编写的《万国通鉴》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意大利的统一。书中指出意大利"小国之君，多行霸道，勒索百姓，于是百姓有数次违逆本国之君，欲脱其重轭，皆被奥王派兵压服"。唯伊曼纽尔二世"公义善良，理政俱按本律，各等人民皆得其保护"。1859年，伊曼纽尔因"欲助以大利之民脱离奥国虐政"而向奥地利宣战，在法国的帮助下击败奥军。次年，"特斯喀尼、谋底纳、怕耳玛、罗曼亚各国百姓，皆欲归撒底尼亚国王管理"。同年西西里岛"有民变之事，因民欲离旧制，改立新制"，加里波第率军援助岛民，"以所胜之数国复命于君"。到1870年，撒丁攻占罗马，"至此以大利民遭遇明君，合为一统，脱离旧日重轭，改立与民有益之制矣"。② 基督教提倡仁爱，在谢卫楼笔下，伊曼纽尔二世不再以靠武力统一意大利的雄主形象出现。同时，作者为迎合中国人的文化观与历史观，又借鉴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将伊曼纽尔描述为帮助人民摆脱苦难的明君，认为后者能够完成统一，乃因施行仁政，各国人民主动归附，这种对意大利统一过程的描述也更加符合史实。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所译的欧洲通史著作《欧洲史略》对意大利统一的介绍基本延续了《万国通鉴》中的论调，称"时意地前此自主诸国，鲜有不受奥、法之欺凌，而降心低首，听命惟谨者"，而"惟撒底尼亚王威多·以马内利，克遵旧章，以理其国"，因此"其他意地人民，莫不乐于为撒属者"。③ 艾约瑟自主编写的《西学略述》中，亦指出伊曼纽尔二世统一意大利是民心所向："至中朝咸丰末年，意地诸民，皆欲复合为一国以自强。时其西北国君有名威多·以马内利者，素有美誉，为众心之所向服，后威君渐次出兵，吞噬诸国，而奄有意国之全土也。"④

不难发现，上述对意大利统一过程的描述均是以伊曼纽尔二世为核心展开的，对于实际主持政局的加富尔，仅《万国通鉴》称其"颇有智慧，欲拯以大利之众民，脱去虐政，且欲各国合为一统，改立与民有益之例"，⑤ 但未提及具体的为政举措。而到19世纪90年代，随着中西交手的屡次失利，中国士人开始关注西方国家的强国之道，这一时期出现的关于意大利统一的叙述，侧重点亦从伊曼纽尔二世的个人品质，转向了加富尔为实现国家富强所进行的改革措施。

1890年，薛福成在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访问欧洲时，为"知我之短，知人之长"，对欧洲各国历史进行考察，注意到了意大利统一进程中加富尔的改革举措："（阿尔勃脱）传位于其子伊曼奴核第二（一译作以马努利第二），用贤相加费尔，除弊修教，阜财惠工，声誉踔起。"⑥

而在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笔下，加富尔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了叙事的中心。1894年，李提摩太与助手蔡尔康合译了英人麦肯齐（Robert Mackenzie, 1823—1881）

---

① 《意大利王薨逝》，《申报》，1878年1月14日，第1版。

② 谢卫楼：《万国通鉴》卷4下，上海书局，1902年，第24-26页。

③ 弗里曼著，艾约瑟编译：《欧洲史略》，王娟、陈德正校注：《〈欧洲史略〉〈西学略述〉校注》，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93-194页。

④ 艾约瑟编著：《西学略述》，王娟、陈德正校注：《〈欧洲史略〉〈西学略述〉校注》，第305页。

⑤ 谢卫楼：《万国通鉴》卷4下，第25页。

⑥ 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张云浩、张英宇标点，1985年，第308页。

的《十九世纪史》(*The 19th Century: A History*)，以《泰西新史揽要》之名出版。该书在西方史学界评价很低，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 1889—1943）曾称其为“第三流历史学著作中最乏味的一些残余”。[①] 然而，书中以进化论的史观夸张地描绘了 19 世纪西方各国从野蛮、无知的状态进步到科学和民主的历程，正因应了李提摩太在华期间积极参与中国的变法事务、宣传改革思想的政治诉求。书中介绍加富尔的段落，在原著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溢美之辞，字里行间透露出李提摩太的向往：[②]

> 意人民主之心突遇法皇之摧抑，欲求寒极而春之境几乎渺不可追，而不知天已生一大救意人之奇杰，先伏处于偏隅也。意人有嘉米禄第嘉富洱者，世袭通侯，家承巨富，意人仰其大名本如泰山北斗，然其仪表则既短且肥，初无奇伟之可观也，其首则极大，其眉目间则英英露爽，一望而知为有才之人，其言语则柔和宛转，使人听之忘倦……夫意民处水深火热之中，匪伊朝夕哀号罔应，呼吁无门，而幸也天之不欲绝意人也，生一嘉富洱侯具大智慧、通大经济，而付之以转移全意之大神通，故无论意人苦至极处，必有甘到尽头之一日也。[③]

对比麦肯齐的原著和《泰西新史揽要》中的译文，可知李提摩太在翻译中将自身的政治理想寄托在了加富尔身上，希望借助译文将改革思想灌输给维新士人。如原著中对于加富尔的改革计划，只用了三个词加以概括：“He returned with a deep conviction that national welfare was impossible without liberty,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freedom of trade.”[④] 而李提摩太则对其内容做出了详细解释，希望能够通过介绍撒丁的富强之道，以引导中国的政治精英接受其改革主张：

> 及回萨谛尼亚，行年三十有八矣，灼知乎兴国之大要有不可欠阙之事三：凡民间举入议院之官，国家有机密事宜与之同心商办，一也。民间与各国通商，国家必许其任意经营，毫不加以禁阻，二也。必使小民皆擅自主之权，三也。[⑤]

值得注意的是，和薛福成相比，李提摩太对加富尔改革思想的叙述不再局限于工商业领域，而已触及到政治体制的层面。除加富尔外，《泰西新史揽要》对加里波第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 且嘉礼巴地治国之道又与他人绝不相似，既不得行其志，遂自忘其三阅月之间灭拿坡螺蛳国，俾丁口九百万众附于萨谛尼亚为一国之大功，使意大利人得以自主之盛事。一旦弃置兵符，潜回佳珀雷辣小海岛之珂里，安贫乐道以终其身。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⑥]

书中还介绍了马志尼创建青年意大利党、宣传革命思想的业绩：

> 再阅数年，意国名流辈起，其声施烂然、才全德备者名曰麦荠腻，以家婆那哩会之不行也，别设一会名曰新意大利会，明言欲在意大利国改立民主而创为二法：一法曰教民，一法曰造反。明于时事之人皆服教民之法，至谋反一事恐非善策，然此会其自始至终更有大造于意，若无此会，恐意国之合而为一不能如是之速也。[⑦]

综上，意大利建国史被介绍到中国后，先后得到不同的诠释，对意大利统一原因的解读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早期的中国士人对西方国家均以“夷狄”视之，在不甚了解其细节的情况下，依据古代中国周边少数民族的传统加以想象，故而将相关历史描述成伊曼纽尔二世以武力统一全国的过程。而传教士则通过译著将这段历史更真实地呈现在晚清士人面前，指出伊曼纽尔二世能够完成国家统一，是因顺应民心，各国主动归附。

---

①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张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43–144 页。

② 考虑到《泰西新史揽要》的翻译主要由蔡尔康执笔，亦有可能是蔡尔康对其文字所作的发挥，但这也说明了作为维新人士的蔡尔康已接受了李提摩太所传播的西学思想，欲借加富尔的改革事迹以呼吁变法。

③ 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蔡尔康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第 316–317 页。

④ Robert Mackenzie,*The 19th Century: A History*, London: T. Nelson and Sons, 1880, p.360.

⑤ 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第 317 页。

⑥ 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第 324–325 页。

⑦ 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第 410 页。

但在西潮的不断冲击之下，中国士人的心态已发生改变。面对坚船利炮的威胁，国人逐渐放弃了文明评价的独自立场和文化与价值上的传统观念，开始从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转变到以强弱为中心的文明优劣观，于是“自强”也成为了中国观念世界的重心所在。[①] 这一时期，传教士也开始注重通过文字工作加强对中国士人的影响，引导中国的上层精英接受西方以“富强”为文明标准的价值尺度。因此到 19 世纪末，引介西方历史知识的目的大多落在为中国提供强国资鉴上，意大利统一亦被解读为一段撒丁通过变法图强而得以统一全国的历史。

而到了 20 世纪，意大利统一又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就是怎样使中国建成一坚强有力之国家组织，俾争强图存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国际社会。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从意大利民族复兴的历程中看到了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开始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对意大利统一加以诠释。意大利三杰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也迅速扩大，成为清末知识界一股重要的思想资源，开启这一风潮的是梁启超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

二、梁启超与《意大利建国三杰传》

1902 年 6 月至 12 月，《新民丛报》刊登了梁启超所作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介绍马志尼、加富尔、加里波第三人的生平事迹及意大利统一的历史。在传记的“发端”中，梁启超交代了作传的理由：

> 欧洲近数百年，其建国之历史可歌可泣可记载者，不一而足；其爱国之豪杰为吾生平所思所梦所崇拜者，不一而足。而求其建国前之情状与吾中国今日如出一辙者，莫如意大利；求其爱国者之所志所事，可以为今日之中国国民法者，莫如意大利之三杰。[②]

实际上，梁启超主张国人学习意大利建国历程的思想，早在流亡日本之前就已形成。1897 年，梁启超主持翻译了根据松井广吉（1866–1937）的《伊太利独立战史》附录部分《伊太利独立诸杰列传》节译出来的《意大利兴国侠士传》。该书实际译者是桥本太郎，内容包括意大利独立战争期间，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等九个重要人物的传记。梁启超为其作序，序言中表明其认为“昔之意乃今之中国也”，因此取《意大利兴国侠士传》译之，希望中国“有侠君侠相侠士起而雪大耻、复大仇，以开新治、御外侮者”。[③]

流亡日本之后，梁启超接触到大量的日文世界史译著，得以创作《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根据松尾洋二的考证，这一传记中关于马志尼的内容，大部分依据的是平田久（1871—1923）编译的《伊太利建国三杰》，而关于加富尔的内容，依据的则是《近世世界十伟人》中所收松村介石（1859—1939）的《嘉米禄·加富尔传》。[④] 崔文东则进一步发现，岸崎昌（1873—1911）的《ガリバルヂー》（《加里波的传》）是该传记第三个重要的文本来源。[⑤] 通过比对原著与梁启超的译文可以发现，梁启超对“三杰”形象的书写在日文史传的基础上，亦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元素，如加里波第在梁启超笔下，被塑造成了一位中国式的江湖侠士：

> 加里波的，舟人子也。性慷慨义烈，感物易哀，嫉不义如仇，喜鸣不平，为人急难，其所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 2 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408–410 页。
②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36 年，第 1–2 页。
③ 梁启超：《意大利兴国侠士传序》，松井广吉著，桥本太郎译：《意大利兴国侠士传》，大同译书局，1897 年，第 1 页。
④ 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第 253–254 页。
⑤ 崔文东：《〈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化用明治日本政治小说考》，《东亚观念史集刊》第 13 期，2017 年 12 月。

愤激感触，趋义赴难，视生命如鸿毛也。①

传记第五节更是着重描绘了其大侠形象：

> 加里波的既不见容于法国，茫茫全欧，托身无所，乃飘然倚剑，远遁于南亚美利加。自兹以往，不踏欧洲尘土者十四年……“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举似世间人，谁有不平事？”千古之大侠，往往被发以救邻斗，拔剑以助路人。盖其至诚热血，磅礴郁积于腔子里，一触即发，非有所为而为之，盖非是则无以为欢也。②

叙述至加里波第献土后退隐时，又高度赞美了其功成身退的高风亮节：

> 此淡泊宁静之将军，举全军全土以献诸王，于一切勋爵无所受，于一切赏赐无所受，不携一驺从，不拾一长物，飘然一身，直归卧于卡菩列拉岛。呜呼！吾遍读古今东西数千年之史传，欲求一人如将军者，岂可得耶？③

而加富尔在《三杰传》中则以中国传统的贤相形象出现。在第三节《加富尔之躬耕》中，梁启超即以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事迹比附加富尔早年在格林扎内（Grinzane）管理庄园的经历：

> 桓灵失纲，四海鼎沸，群雄拊髀攘臂之际，而绝代伟人诸葛亮乃躬耕于南阳；当法国革命，全欧如麻，豪杰蜂起水涌之时，而绝代伟人加富尔乃学圃于黎里。④

而写到伊曼纽尔二世继位后，加富尔接替达志格里阿（Massimo d’Azeglio, 1798—1866）继任宰相的事迹，作者又借鉴了齐桓公听鲍叔牙而任命管仲的故事：“非有贤王不能庸奇才，非有名相不能让贤路，达志格里阿亦人杰哉”，“时撒丁王于加富尔，犹齐桓公之于管仲也”。⑤

到第十六节则更细致地刻画了加富尔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形象：

> 彼以一身立于举国怨毒最深、感情最烈、义侠最迫、骚扰最剧、窘厄最甚之盘涡中，内之压制如沸如腾之革命，外之睨视如虎如狼之大敌，旁之应付如鬼如蜮之列邦，而又揣摩大势，攫得一千载一时之机会于手中，故得以至静制天下之至动，以至柔制天下之至刚，始终以沉着慎重温和忍耐之态度出之，沉着慎重温和忍耐者，实加富尔一生成功之不二法门也。⑥

如果说加里波第和加富尔分别被赋予了“大侠”和“名相”的形象，那么对马志尼的描述则是梁启超的夫子自道。在梁启超笔下，马志尼为“再建一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意大利”而创立“少年意大利党”，并“自创一报馆”，“以其高尚纯洁之理想，博通宏赡之学识，纵横透辟之文辞，洒热血于笔端，伸大义于天壤”。又上书撒丁王阿尔贝托（Charles Albert, 1798–1849），表达其民族统一的理想，却不能为后者所容，被迫流亡英国，长期定居于此，“英国者，实玛志尼第二之故乡也”。马志尼在英国生活困苦，“然犹日日奔走呼号，和血与泪，从事于著述，遂更组织一新党，名曰‘少年欧罗巴’，外以通他石之情，内以系同胞之望，如是者又十年，盖此十年中，而其所谓教育国民之主旨，乃磅礴圆满，而此后如荼如锦之意大利，根柢乃始立矣”。⑦对马志尼事迹的描写，处处可见梁自身的身影浮现于其间。

庚子之变后，清廷已普遍被视作“失道”，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已不相信政府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通过报刊和学会等新式媒介来对一般社会大众进行国家意识的灌输，希望以开启民智的方式来实现“保国保种”的目的。因此，和主张变法的李提摩太对加富尔的向往不同，梁启超将政治理想寄托在马志尼身上，故在传记第九节中直言马志尼为

---

①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 · 专集之十一》，第 4 页。
②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 · 专集之十一》，第 14 页。
③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 · 专集之十一》，第 48 页。
④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 · 专集之十一》，第 10 页。
⑤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 · 专集之十一》，第 26–27 页。
⑥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 · 专集之十一》，第 38–39 页。
⑦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 · 专集之十一》，第 6–9、12–14 页。

意大利复兴运动中贡献最大者：

> 故论意大利建国之功，首必推玛志尼，天下之公论也。玛志尼耕焉，加富尔获焉，试问获者之功德视耕者何如矣？……前此无玛志尼，则虽有百加富尔，而大功终不可就，后此无加富尔，则夫受玛志尼之感化者，岂患无人起以获其实也？故造意大利者三杰也，而造彼二杰者玛志尼也。至是而玛志尼退矣，至是而意大利成矣。①

在梁启超笔下，“三杰”的人格特质各异，但无疑都是围绕着爱国主义这一核心书写的。创作《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时的梁启超，已开始接受伯伦知理（Johann Kaspar Bluntschli, 1808—1881）的国家主义思想，将国家视为最高的政治价值。② 对这一时期的梁启超来说，国家是一个精神和有机的实体，其主权不在统治者，也不在人民，而在于国家本身，政治制度只是服务于国家的工具。③ 因此，虽然“三杰”所持的政治立场各异，甚至因而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但在梁启超看来，这只是手段的不同，“三杰”的最高理想仍是一致的，就是使国家统一：

> 玛志尼非有憎于其王也，以是多不足以达爱国之目的，故始终敌之；加富尔非有私于其王也，以是为可以达爱国之目的，故始终奉之；加里波的亦非有憎有私于其王也，当其见为可以达此目的也，则奉之，当其见为不可以达此目的也，则敌之。彼等之视其王，皆若无物也，非轻王薄王，以为以王与国比较，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不能以此分其爱也。④

在梁启超之前，便已有希望以意大利统一的历史来为中国提供借鉴，以帮助中国走向富强的先例，但梁启超所作传记的主旨和前人相比已经有了显著差异。梁启超认为，近代西方国家向外扩张时，不只是通过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操纵，而通常是这个国家所有国民集体努力的结果。而为了抵制这种不断扩张的帝国主义，就必须要发展中国的民族主义，只有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才能抵抗一个外来民族合力推进的扩张。⑤ 因此，梁启超的文章不再局限于介绍撒丁实现富强的改革措施，而是通过描绘“三杰”的感人事迹，来激励全体国民的爱国精神。他在传记中呼吁：

> 抑意大利有名之三杰，而无名之杰尚不啻百千万。使非有彼无名之杰，则三杰者又岂能以独力造此世界也？吾学三杰不至，犹不失为无名之杰，无名之杰遍国中，而中国遂为中国人之中国焉矣。⑥

然而，梁启超的这种全民主义又充满了唯意志论（voluntarism）的色彩。梁启超在传记中强调历史主体的能动性，重视意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指出“凡国之存亡，在其精神，非在其形质也。苟无精神，则虽以今日拥二万万里地麋四万万余人之中国，不得不谓之亡。苟有精神，则虽以当时分裂仍旧压制仍旧之意大利，不得不谓之存”。⑦ 梁启超真诚地相信，只要国民有强烈的争自存的欲望，就会有强大的国民力，国家必然因之而强大。因此，梁启超写道：

> 人人心目中有祖国，而祖国遂不得不突出不涌现。佛说三界唯心所造；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西哲曰：人皆立于所欲立之地……故吾以为欲造新中国，必有人人自欲为三杰之一之心始，人人欲为三杰之一，未必即能为三杰之一，而千百人欲之，则一二之真似者必出焉矣，即不能而合十人而得似其一焉，合百人而得似其一焉，则我有三十杰三百杰，而必可任彼三杰所任之事业，而何国之不能救也？⑧

---

①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一》，第 25 页。
② 李春馥：《论梁启超国家主义观点及其转变过程》，《清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
③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年，第 195-196 页。
④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一》，第 59 页。
⑤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 122-123 页。
⑥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一》，第 61 页。
⑦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一》，第 24 页。
⑧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一》，第 57-58 页。

同时，梁启超在强调全体国民是历史的主体时，内心实际上又认为少数精英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正如其在《豪杰之公脑》一文中所说："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豪杰则无有世界。一国虽大，其同时并生之豪杰，不过数十人乃至数百人止矣，其余四万万人，皆随此数十人若数百人之风潮而转移奔走趋附者也。"① 梁启超在传记中称："无三杰则无意大利，三杰缺一，犹无意大利"，② 而"苟吾国有如三杰其人者，则虽时局艰难十倍于今日，吾不必为祖国忧"。③

梁启超在《加布儿与诸葛孔明》一文中对蜀汉和意大利所作的对比，最可体现其内心中是如何看待这两种观念的。梁启超在文中指出，蜀汉没能如意大利般复兴是因为"蜀汉之国民，又非意大利国民之比也"。然而对其原因，梁启超解释道："意大利之企画一统者，全国之国民也，而蜀汉之企画一统者，诸葛一人而已。凡事而专属于一人者，此一人去而大事皆去矣。"④ 由此可见，在梁启超作品中民主观念的表层之下，隐藏着实质上的精英主义，并与全民主义形成了一种吊诡的结合。

从梁启超对"三杰"的热情赞美可以看出，20 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与 19 世纪时已完全不同。中国士人原本视洋人为野而不文的"夷狄"，对其历史的接受怀有一种踟蹰与抗拒的心态，需要依靠传教士作为先导。而正如罗志田所观察到的，随着中国在中西文化竞争中的失败，清季士人开始主动承认西方为文明而自认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从开始的降节学习"夷狄"之"长技"发展到倾慕"泰西"的学问，蜂拥出洋游学，思想界和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⑤ 梁启超为传播民族主义而为"三杰"作传，然而如前所述，传记中对"三杰"性格的描述均是根据中国传统中已有的形象塑造而成，但宣扬这些中国文化中固有的品格，却需要借助西方人物来增加其说服力，最可提示中西"话语权势"的转移。

三、"意大利建国三杰"在近代中国的多重回响

梁启超以其"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描写三位英雄前赴后继，终于实现国家统一的事迹，很快便风靡于晚清社会。1903 年李书城在《湖北学生界》发表的文章《学生之竞争》中提出，希望今日中国之学生"读意大利独立史，观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的之激昂"，"考古人已演之活剧，登今日创新之舞台"。⑥ 郭沫若曾有回忆："他（梁启超）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斯麦之余，便是崇拜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⑦ 毛泽东早年亦受到"三杰"的影响："我崇拜过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看他们的传记。"⑧ 小说《黄绣球》中，也对"三杰"在晚清社会的流行进行了描写："大家改了新学的口头禅，路得、卢梭、玛志尼、拿破仑，纷纷的议论不休，民约、民权、天演、物竞，也纷纷的拉扯不清。"⑨

除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外，《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的影响还进入史学领域。20 世纪初，大量西史著作传入中国，国人在翻译这些西书时，进行了有选择的改写，梁启超的作品便通过这些改写参与到晚清世界史知识的建构之中。如麦鼎华在翻译轩利普格质顿（Harry Pratt Judson,

---

① 梁启超：《自由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中华书局，1936 年，第 33 页。
②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一》，第 2 页。
③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一》，第 61 页。
④ 梁启超：《自由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 29 页。
⑤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原序第 2 页。
⑥ 李书城：《论说：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 2 期，1903 年，第 3-4 页。
⑦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 11 卷《沫若自传第一卷——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21 页。
⑧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51 页。
⑨ 颐琐：《黄绣球》，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年，第 122 页。

1849—1927）所著《欧洲十九世纪史》（*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时，在介绍意大利统一的章节中便加入了原文所没有的“故世谓三者为意大利建国三杰”一语。[①] 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梁启超所塑造的“三杰”形象亦在官方的史学教育中得到认可，京师大学堂 1902 年 10 月的外国史招生试题共有十二问，其中第四问即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为谁？其所事之异同若何？”[②]

在这股风潮的影响下，清末又出版了两种加里波第的传记。1902 年广智书局出版的《意将军加里波的传》承袭了梁启超所描绘的大侠形象，称加里波第“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撑支于腥风血雾之中，匹马横刀，澄清天下，披荆斩棘，恢复国疆，遂使二千九百余万之人民，复得吐气伸眉于生存竞争之世，以还彼祖宗历祀之光荣”。[③] 1911 年林万里所著《少年丛书：加里波的》则参考了新的日文史料，对加里波第的事迹进行了补充。同时，作者为避免国人读过梁启超的作品后，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英雄身上，强调“加里波的者，亦不过时代之产物也；彼之精神，社会精神之表现也；彼之结果，社会之结果也……故凡为国民者，不可无崇拜英雄之心。然崇拜英雄，非倚赖英雄之谓”。[④]

不过，恐怕令梁启超始料未及的是，意大利建国史作为一个凝聚了多重意义的宏大叙事，在清末被不同的政治群体所重新诠释并赋予了新的意义，参与到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争之中。梁启超作传的本意是激发国民的爱国主义，因此“三杰”在其笔下均以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出现，但清末的革命党人在读到梁启超对马志尼的描写后，却注意到了其作为革命家的面相。作为立宪派代表的梁启超，其大力颂扬的马志尼却持有和自己相反的政治立场，面对这一矛盾，梁启超解释道：

> 无革命之论，则立宪终不可成。通观今世界之立宪君主国，何一非生于革命风潮最高点之时代也？且立宪国有两事最不可缺：其一，则君主不敢任意蹂躏宪法；其二，则国民知宪法之可宝贵是也。凡已有特权者，谁乐分之以与人？故民间无革命思想，则君主断不能以完全之宪法与民，一也。凡得之太易者，则视之不重，视之不重者，则守之不牢，故民间苟非以千血万泪易得宪法，则虽君主三揖三让以畀之，而亦不能食其利，二也。故无论欲革命者当言革命，即欲立宪者固不可不言革命，即已不欲言，亦不可不望有他人焉言之。[⑤]

然而，马志尼作为革命家的身份在清末得到放大，成为众多革命派人士所仰慕的对象。如同盟会的成员高旭便将马志尼和为推翻沙皇专制而献身的女革命家苏菲亚（Sophia Perovskaya, 1853–1881）相比以表达其革命理想：“娶妻当娶苏菲亚，嫁夫当嫁玛志尼。”[⑥] 而金松岑则将马志尼和法国大革命放在同一语境之下：“娶妻当娶韦露碧，生儿当生玛志尼。得听雄鸡三唱晓，我侬身在法兰西。”[⑦]

同时，在民族主义这一层面，革命党对意大利统一的诠释也与梁启超有很大差别。中国民族主义在其形成的关键阶段，分化为两种思潮：一派以梁启超为代表，将民族主义主要看成是迎接外来帝国主义挑战的一个结果；另一派则以孙中山和他的革命派为代表，主要将反满作为民族主义的方向。[⑧] 在梁启超笔下，奥地利作为意大利民族解放最大的障碍，所隐喻的显然是

---

① 轩利普格质顿著，麦鼎华译：《欧洲十九世纪史》，广智书局，1902 年，第 41 页。
②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 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267 页。
③ 广智书局编译：《意将军加里波的传》，广智书局，1903 年，第 1 页。
④ 林万里：《少年丛书：加里波的》，商务印书馆，1918 年，第 2 页。
⑤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 · 专集之十一》，第 24–25 页。
⑥ 高旭：《报载某志士送其未婚妻北行，赠之以诗，而诗阙焉，为补六章》，郭长海、金菊贞编：《高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94 页。
⑦ 金松岑：《陈君去病归自日本，同人欢迎于任氏退思园，醉归不寐，感事因作》，《江苏》1903 年第 5 期。
⑧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 125 页。

帝国主义列强，然而在革命党人眼中，颂扬“三杰”为抗击奥地利所做的斗争，指向的却是排满的目标。如柳亚子在自传中回忆，1902 年读《新民丛报》时，“最喜欢他（梁启超）的《意大利“三杰”传》和《新罗马传奇》，中间描写玛志尼和加里波的两人的姿态，非常的能感动人。读了这些，排满革命的感情，是不期然会油然而生的”，① 并称赞章太炎、邹容：“祖国沉沦三百载，忍看民族日仳离。悲歌咤叱风云气，此是中原玛志尼。”②

辛亥革命后，救亡图存的任务远未完成，梁启超所塑造的“三杰”形象经时不衰，继续作为培养国民爱国主义的重要资源发挥着作用。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对“三杰”事迹的宣传迎来了第二次高潮，又出版了多部相关专著，以鼓舞国民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这一阶段国内对“三杰”的译介已不再通过日本作为中介，而是转向以参考英文资料为主，随着相关著作的不断问世，“三杰”在中国知识界的面貌也逐渐清晰。

面对日军对东北地区的侵略，郭垣于 1933 在《平明杂志》上连载了《意大利民族英雄玛志尼传》。该书主要参考梁启超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而成，作者在书中指出，今日被侵于暴日的中国，正如昔日被蹂躏于奥地利的意大利，因此“作玛志尼传，以为爱国同胞的鉴镜”。③

相关著作中最重要的是柳静明主编的《复兴意大利之三杰》。该书出版于 1936 年，其时中国正处于日军加紧入侵的危急关头，因此作者旨在通过介绍“三杰”事迹来激起国人的爱国之心。该书收录了四篇关于“三杰”的文章，其中柳氏自撰的《意大利统一中之凯富尔》介绍了加富尔的生平事迹。与梁启超的著作相比，该传记补充了加富尔的教育背景和其对待宗教的态度。④ 另外三篇文章均围绕马志尼展开，拓宽了国人对后者的认知。李守廉的《意大利建国圣杰马志尼》强调了马志尼的革命学说都以实现国家统一为出发点，其革命理论包括天赋人权说、实践（Action）说、一体（Unity）说和爱国心，并提出马氏对意大利有三个贡献，包括统一驱奥和民治的教训，而其最大的成功还是对意大利民族道德的教训。⑤ 阎白痴的《意大利的建国英雄马志尼》归纳了马志尼人类的义务论（The Duty of Man）的四个特征：幸福非人生的目的、生命是种义务、休息是罪恶、思想与行动必须一致。⑥ 振声所作《复兴意大利的三位民族英雄之比较》则指出马氏的理想是建立在宗教之上的，其认为民族解放是意大利民族对上帝所负的特殊使命。⑦

另一位对相关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是郑家稼。1942 年，郑家稼的《加里波的传》出版，书中详细还原了加里波第的生命历程，并认为加里波第是“意大利统一运动之历史的人格化”，“伟大中的最伟大者”。⑧ 同年，郑家稼还为梁启超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做了注释，对书中“关于史实叙述简单不明或错误的地方，都附以补文及改正的注释”。⑨

这一时期国内还引进了两部有关“三杰”的译著。第一部是许天虹所译意大利文学家西洛尼（Ignazio Silone, 1900—1978）的《玛志尼》（*The Living Thoughts of Mazzini*），内容包括编者从马志尼的全集中摘取出来的认为最可以表明其思想的作品。⑩ 第二部是王开基所译法国外交官帕莱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 1859—1944）的《兴国英雄加富尔》（*Cavour*），和国内著述相

---

① 柳无忌、柳无非编：《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45 页。

②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柳亚子文集：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8 页。

③ 郭垣：《意大利民族英雄玛志尼传》，《平明杂志》1933 年第 2 卷第 7 期，第 24 页。

④ 柳静明：《意大利统一中之凯富尔》，柳静明等：《复兴意大利之三杰》，上海汗血书店，1936 年，第 1–34 页。

⑤ 李守廉：《意大利建国圣杰马志尼》，柳静明等：《复兴意大利之三杰》，第 35–74 页。

⑥ 阎白痴：《意大利的建国英雄马志尼》，柳静明等：《复兴意大利之三杰》，第 75–117 页。

⑦ 振声：《复兴意大利的三位民族英雄之比较》，柳静明等：《复兴意大利之三杰》，第 119–162 页。

⑧ 郑家稼：《加里波的传》，青年出版社，1942 年，第 102–103 页。

⑨ 梁启超著，郑学稼注释：《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0 年，第 1 页。

⑩ 西洛尼：《玛志尼》，许天虹译，改进出版社，1941 年。

比，该书补充了关于加富尔私人品德和家庭生活的内容。①

抗日战争期间，意大利建国史本身也得到了新的诠释，如龚弘的《意大利抗战建国小史》即将意大利统一解读为一部抗击外敌的历史。作者认为中国想要在抗战中获胜急需外交上的努力，因此全书围绕着加富尔的外交事业展开。作者将加富尔外交成功的关键总结为“外交刻刻操之在我，而我之自力更生亦丝毫不离外交政策之后”。②

除此之外，意大利建国“三杰”的形象还进入历史教学中，通过教科书这一载体在民国社会进一步流传开来，成为近代中国读书人的集体记忆。许天虹即回忆道：“‘玛志尼’这一名字，我们是相当熟悉的；在小学里读书时，我们就知道他是‘意大利复兴“三杰”之一’，是一个著名的革命家、伟大的爱国者”；而“普通的《西洋史》告诉我们，其他的‘二杰’——喀富尔和加里波的——一个是辅佐沙丁尼亚王维克多·爱麦虞限完成‘复兴’大业的宰相，另一个是领导西西里和拿波里的革命运动、促成意大利‘统一’的将军”。③

整体考察20世纪初国人对于意大利统一的叙述，可以发现和19世纪相比，伊曼纽尔二世在叙事中已退居边缘地位，统一的完成归功于马志尼、加富尔、加里波第三人。这种差异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国家观念的转变。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中，君主是国家最主要的主权象征，因此国人对中西历史的书写均以君主为中心展开。随着西学的冲击，传统王权所依托的宇宙论开始瓦解，中国知识分子在儒家思想中有关“公”的概念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的“民约论”和“国家有机论”等思想，形成了一种建构在西方智识与中国传统知识之上的混合了“主权在民”与“国家至上”的新的国家观念。④ 在这种国家理论中，国家和国民被视为一体之两面，“国民者，与国家本为一物，异名同实，要不能离为二也”。⑤ 从这种整体式的“国民”观念出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复指摘的国民弊病之大端，便是国家思想之欠缺。因此，进入20世纪后，西方历史的引介被赋予了服务于全体国民、激发群体性民族主义意识的功能。故而这一阶段的相关叙述中，“三杰”作为爱国主义的典范，成为意大利统一叙事的中心。

四、余论

如本文所大致勾勒的，意大利建国史最先通过考察团浮现于中国知识界，后又经传教士的工作完整地呈现在晚清士人面前，伊曼纽尔二世作为这段叙事的中心，先后以雄主和贤君的形象出现。随着中国逐渐服膺了西方以富强为文明标准的价值观念，中国士人开始关注西方历史对中国的资鉴价值，加富尔因其改革措施而受到了重视。20世纪初，“保国保种”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公共议题，梁启超为了唤起国人的爱国主义，以动人的笔触描绘了马志尼、加富尔和加里波第三人为国家奋斗的历程。“三杰”的形象迅速在清末知识界流行开来，而马志尼作为反抗专制的象征，亦参与到清末的革命话语之中。民国时期，“三杰”继续作为爱国主义的思想资源发挥着作用，到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又涌现出大量“三杰”的相关传记，以激励国民抗日救国的斗志。伴随着这些宣传，“三杰”的形象亦进入教科书中，成为民国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

不过，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下，“三杰”的形象亦被不可避免地工具化了，诠释者为了让其塑造的人物形象产生作用，有意识地挑选和忽视“三杰”的某个面相而立论，以致三人的形

① 帕莱奥洛格：《兴国英雄加富尔》，王开基译，正中书局，1944年。
② 龚弘：《意大利抗战建国小史》，独立出版社，1941年，自序第2页。
③ 西洛尼：《玛志尼》，译后记，第1页。
④ 沙培德：《清末的国家观：君权、民权与正当性》，许纪霖、宋宏编：《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68页。
⑤ 伤心人：《论中国国民创生于今日》，《清议报》第67期，1900年，总第4241页。

象和他们原来的面貌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综观诸多对“三杰”形象的描绘，能看出其背后有一条潜流贯穿其间，即这些叙事中所包含的民族主义关怀。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中国近百年来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从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侵略中站起来，我们不惜牺牲个人的自由，来完成民族的自由”。①

然而，“三杰”在追求国家统一的同时，又均以不同方式为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而奋斗。例如，马志尼坚持不懈地鼓吹国家统一的思想，唤起了意大利的民族主义，但国家统一仅是马志尼理想的一个部分，其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民族统一只不过是以民主为标志的世界统一的准备阶段”。② 他抱有一种宗教式的理想，力图寻求一种超民族的世界组织，以便按照民主、博爱和进步的原则，使所有的人联合与团结在一起。因此，马志尼在呼吁国家统一的同时，还要求意大利必须建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而当意大利最终在撒丁王国的主导下实现统一时，他感到全部理想的破灭。

但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一意追求国家的富强，他们在理解西方自由民主传统时，强调以民主制度作为追求国家富强的方法，而忽略了民主作为保障个人自由的终极目的。如梁启超在为“三杰”作传时，虽然注意到了意大利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同时也完成了反抗专制的任务，称意大利于 19 世纪初和中国相比“其专制之惨酷也相类”，然统一后“内举立宪之美政，外扬独立之威烈”。③ 然而，在梁启超看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意义根源在于巩固国家权力、保障群体生存上所能发挥的工具性效用。对梁启超来说，“三杰”对待不同政体的态度，只不过取决于其是否“可以达爱国之目的”。因此，他认为虽然马志尼的民主理想破灭了，“然则玛志尼瞑乎？曰瞑矣。无意大利则玛志尼忧，有意大利则玛志尼乐，彼心目中惟有意大利，更无玛志尼也”。④ 这里，梁启超颠倒了马志尼思想中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场跨文化的知识旅行，意大利建国“三杰”的形象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反映了文化心理的转移与价值的重构。反思中国近代意大利建国史书写中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民族主义的现实需要缠结互动的表现样态，完整地呈现西方历史人物的复杂面貌，有利于促进我们真正理解西方政治文明的深刻内涵，这是留给史学工作者的机遇与挑战。

References

Edkins, Joseph. *Ouzhou shilue* (European history), *Xixue lueshu* (Overview of Western Learning). ed. Wang Juan, Chen Zhengde.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2018.

Gong Hong. *Yidali kangzhan jianguo xiaoshi* (The history of Italy’s resistance to foreign enemies and founding). Chongqing: Duli chubanshe, 1941.

Guangzhi shuju. *Yijiangjun Jialibodi zhuan* (Biographies of Garibaldi, Italian general). Shanghai: Guangzhi shuju,1903.

Kishizaki Masa. *Garibaldi*. Tokyo: Hakubunkan, 1900.

Liang Qichao. *Yidali xingguo xiashi zhuan* (Biographies of the three heroes of the building of Italy). Shanghai: Zhonghua shuju, 1936.

Liang Qichao. *Ziyou shu* (Freedom). in *Yinbingshi heji* (Ice−drinking room combined collected works) Vol. 2. Shanghai: Zhonghua shuju, 1936.

Lin Wanli. *Shaonian congshu: Jialibodi* (Youth Series: Garibaldi).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1918.

---

①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年，第 203 页。

② 焦瓦尼・斯帕多利尼：《缔造意大利的精英——以人物为线索的意大利近代史》，罗红波、戎殿新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第 180 页。

③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一》，第 3、57 页。

④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一》，第 24 页。

Liu Jingming. *Fuxing Yidali zhi sanjie* (The three heroes of the building of Italy). Shanghai: Hanxue shudian, 1936.

Mackenzie, Robert. *Taixi xinshi lanyao* (The 19th Century: A History). Translated by Richard, Timothy, Cai Erkang. Shanghai: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 2002.

Matsui Sakichi. *Yidali xingguo xiashi zhuan* (Biographies of the heroes of the building of Italy). Translated by Hashimoto Taro. Datong: Datong yishuju, 1897.

Naoki Hazama. *Liang Qichao, Mingzhi Riben, Xifang* (Liang Qichao, Meiji Japan, Occident).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01.

Paléologue, Maurice. *Xingguo yingxiong Jiafuer* (Cavour). Translated by Wang Kaiji. Chongqing: Zhengzhong shuju, 1944.

Sheffield, Devello Zelotes. *Wanguo tongjian* (World history). Shanghai: Shanghai shuju, 1902.

Silone, Ignazio. *Mazhini* (The Living Thoughts of Mazzini). Translated by Xu Tianhong. Yongan: Gaijin chubanshe, 1941.

Xue Fucheng. *Chushi yingfayibi siguo riji* (Diary of serving as an envoy to Britain, France, Italy and Belgium). Changsha: Yuelu shushe, 1985.

Zhang Hao. *Liang Qichao yu Zhongguo sixiang de guodu, 1890–1907*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Translated by Cui Zhihai, Ge Fuping. Beijing: Zhongyang bianyi chubanshe, 2016.

Zheng Xuejia. *Jialibodi zhuan* (Biographies of Garibaldi). Chongqing：Qingnian chubanshe, 1942.

Zhi Gang. *Chushi taixi ji* (The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hangsha: Hunan renmin chubanshe, 1981.

The Shap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Three Heroes of the Founding of Italy" in Modern China

YUAN Hongyu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yuanhy1995@126.com)

QIN Fa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fqin@cnu.edu.cn)

Abstract: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work of missionaries introduced the "three heroes of the founding of Italy" to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Various groups in modern China ha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images of the three heroes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positions and purpose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Liang Qichao's translation of *the Biographies of the Three Heroes of the Founding of Italy* made the image of the three heroes widely spread in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resource to spread patriotism. The issue of saving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and striving for survival ran through the whol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levant deeds of the three heroes were constantly publicized and become part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However,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modern China, the images of the three heroes were inevitably instrumented, so that there was a considerable distance between their images and their original appearance.

Keywords: three heroes of the founding of Italy, Liang Qichao, imagology, nationalism